

· 内部刊物 ·

西北历史资料

1980 2

目 录

温末考	周伟州 (1)
《十至十四世纪维吾尔王国的 经济和社会制度》一书的引言	(苏)吉洪诺夫著 姬增禄译 (9)
《清光绪九年勘定俄国借地界图》实为 同治年间塔城军民在科布多借住地界图	李之勤 (25)
读《饶应祺函、电、奏稿》札记	王 威 (31)
十九世纪三十至五十年代北京传道团和俄中贸易	(苏)格·尔 著 赵春晨译 (36)
俄国驻北京传道团人员名单	(苏)斯卡奇科夫著 豁 达译 (41)
天山游记 (第二章)	(俄)谢苗诺夫著 李步月译 (47)
张澍及其著述	王宗维 (72)
明代陕西植棉业的发展	志 勤 (94)

西北大学西北历史研究室

一九八〇年七月

温 末 考

周 伟 州

一、温末的名称及组成

公元八世纪中，唐朝安史之乱后，建立在我国西南的吐蕃王朝相继攻陷了唐朝的河西、陇右之地，统治达百年之久。所谓“温末”，就是吐蕃统治河陇地区时，对该地奴隶的称呼。唐末，吐蕃势衰，这部分奴隶就互相聚合，以温末自号。所以《新唐书》卷二百一十六下《吐蕃传》记：“浑末，亦曰温末，吐蕃奴部也。虜（吐蕃）法，出师必发豪室，皆以奴从，平居散处耕牧”。浑，唐韵户昆切；温，唐韵乌魂切。两字音相近，译写不同的原故。

王忠《新唐书吐蕃传笺证》以为：“温末或即‘gyog’，仆役之义，就其军中职务而言，吐蕃最小战斗单位为四人组成，一人为组长，称组本（chug—pon），一人为副组长，称俄本（’og—dpon），一人为炊事兵，称贞普（byan—po），另一人即为仆役，称贞温（byan—gyog）。炊事兵以下似即称温末，所谓‘奴号’是”①。从现有的资料来看，温末并非是吐蕃所有奴隶的称呼，而仅是指其统治的原唐朝河陇地区奴隶的称呼。吐蕃占领河陇地区后，即设置官吏，驻守军队。按上引《新唐书·吐蕃传》的说法，温末即是指随吐蕃主人出征的奴隶，他们被遣到河陇地区后，战时随主人打仗，为士卒，平时则“散处耕牧”。

温末的组成是极为复杂的。其主要成份应是吐蕃原有的旧奴。所谓“旧奴”即是吐蕃王朝建立前后，征服邻近其它民族部落所俘获的奴隶。据敦煌所出《吐蕃历史文书》的记载，松赞干布的父亲郎日论赞（《新唐书》作论赞索）在位时（约当六世纪中），吐蕃吞并了在今西藏北部的苏毗（又名孙波、女国）之后，赞普一次赏赐有功臣子的奴隶，就达一千多名②。以后，松赞干布统一西藏高原，先后又灭掉了今西藏阿里地区的羊

同，苏毗东面的多弥（今四川通天河一带）。七世纪三十——四十年代，松赞干布又进攻今青海湖一带立国的吐谷浑，使其迁避于“青海之阴，尽取其资畜”。“又攻党项（今青海东南及甘肃南部一带）、白兰羌（在青海都兰县一带），破之”③。吐蕃统治者在掠夺和征服周围这些部落时，掳掠了大量的财物和奴隶，有时则奴役整个被征服的部落。如《新唐书》卷二百二十一上《西域党项》记：“后吐蕃寔盛，……地乃入吐蕃，其处者皆为吐蕃役属，更号弭药（me-n'ag）。”

上述这些被掳掠的各族人民，大部分为吐蕃大小贵族所占有，成为奴隶。当吐蕃占领唐朝河陇地区后，部分贵族就带着奴隶到这里驻守，“往往一家至十数人”④。这部分奴隶就构成了温末的主体，并且以后逐渐藏化。

吐蕃占领河陇，将大批汉族人民，“悉以为婢仆”⑤。这部分汉人奴隶，是否也叫温末呢？据斯坦因在敦煌劫走的一份关于张议潮的进表中说：“张议潮奏：咸通二年（861年）收凉州（治今甘肃武威），今不知郤口口杂蕃、浑，近传温末隔勒往来，累询北人，皆云不谬。伏以凉州是国家边界，温末百姓本是河西、陇右陷没子将（孙）……”⑥。表中明确指出：“温末百姓本是河西、陇右陷没子将（孙）”。可见，唐人所谓的“温末”也包括一部分河陇陷入吐蕃统治者手中的汉族奴隶。吐蕃统治者有时也强迫部分汉族奴隶充当士兵，随主人出征。《新唐书·吐蕃传下》记：“初，吐蕃盗塞，畏春夏疾疫，常以盛秋。及是得唐俘，多厚给产，质其孥，故盛夏入边”。

此外，据《通鉴》卷二百五十，唐懿宗咸通三年（862年）十一月记：当吐蕃温末起义后，势力很大，“吐蕃微弱者反依附之”。也就是说，在温末中，也包括了吐蕃人（藏族）在内。这部分反依附温末的吐蕃人，可能主要是河陇地区吐蕃“微弱者”，即平民或中、小奴隶主。

综上所述，吐蕃温末主要是由随主人到河陇的奴隶（旧奴），河陇的部分汉族奴隶以及吐蕃人组成。其民族成分十分复杂，有原邻近吐蕃的羊同、苏毗、党项、多弥、白兰、吐谷浑（以上属氏、羌和鲜卑），以及河陇的汉族、吐蕃人，等等。其中汉族奴隶和后来依附温末的吐蕃人，原来并不叫温末，只是在温末起义后，他们加入起义的队伍，因而也就统称为温末了。

二、温末起义的原因及活动情况

九世纪初，吐蕃王朝已渐趋衰弱，大规模的掠夺战争已停止，于是奴隶来源发生了问题。这样，吐蕃内部奴隶与奴隶主之间的矛盾、统治阶级之间的矛盾，以及吐蕃统治者与被征服地区人民的矛盾，都日趋尖锐。在这些矛盾中，与河陇地区温末起义的爆发有直接关系的，除了温末与吐蕃统治阶级的基本矛盾之外，主要就是吐蕃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

唐代河陇之地一向是个民族关系复杂、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地区。这里有原唐朝直接统治下的封建经济占优势的地区，也有原属唐朝管辖，但仍处于原始社会末期或奴隶制阶段的其它民族的居住地区。如吐谷浑、党项、白兰等。吐蕃占领河陇后，把被征服的各族人民变为奴隶，残酷地剥削和压迫他们。以河陇唐人奴隶为例。吐蕃统治者对当地人民，“其无能者，使应所在役使，辄黥其面，粗有文艺者，则涅其右臂，从候赞普之命。得华人补为吏者，则呼为舍人”^⑦。唐人沈下贤亦记：“又尝与戎降人言：自轮海已东，神鸟、敦煌、张掖、酒泉东至于金城、会宁，东南至于上邽、清水，凡五十郡、六镇、十五军，皆唐人子孙，生为戎奴婢。田牧种作，或从居城落之间；或散处野泽之中”^⑧。所以，在吐蕃统治下的河陇地区，奴隶主与奴隶之间的阶级矛盾、各族人民与吐蕃统治阶级的民族矛盾都十分尖锐。这一基本矛盾，又因吐蕃统治集团的内争和唐朝加紧收复河陇地区的战争，而日趋激烈，终于促使温末爆发了反抗吐蕃统治的起义。

吐蕃统治阶级的内争，是以其特有的宗教斗争形式表现出来的。八四一年（唐武宗会昌元年），大力勃兴佛教的吐蕃赞普热巴金被反佛教的大臣拔贾朵若等所杀^⑨。拔贾勾结信奉钵教（吐蕃的原始宗教）的贵族，利用广大平民对兴佛的不满^⑩，拥立热巴金弟郎达马为赞普。不久，郎达马即在全境开始了一个大规模的灭佛运动。许多佛教徒惨遭惨杀，寺院被毁灭，吐蕃本土陷入了一片混乱的局面。加之连年灾荒，“国值饥馑，盗贼蜂起，疾疫流行”^⑪，吐蕃王朝已处于灭亡的边缘。八四六年（唐武宗会昌六年），郎达马被一僧人所杀^⑫，与统一的吐蕃王朝开始瓦解。

吐蕃本部的内争，又引起河陇一带吐蕃将领们的混战。八四七年左右，吐蕃洛门川（今甘肃陇西洛门镇）讨击使尚恐热在渭州（甘肃陇西县西南）击败了新立赞普乞离胡

的大相尚思罗^⑬。为了解除夺取政权的障碍，恐热又发兵向吐蕃鄯州（治今青海乐都）节度使尚婢婢进攻。两者的混战从八四七年一直打到八五〇年。结果尚婢婢战败，退出鄯州，恐热也因此而衰弱。河陇地区吐蕃将领的混战，给当地各族人民带来了空前的灾难，促使该地基本矛盾更加尖锐。《通鉴》卷二百四十六记：恐热击杀尚思罗后，“自渭川（州）至松州（治今四川松潘），所过残灭，尸相枕藉”。同书卷二百四十九也记：恐热击走尚婢婢后，“……遂大掠河西、鄯、廓（治今青海化隆）等八州，杀其丁壮，剜削其羸老及妇人，以梨贯婴儿为戏，焚其室庐，五千里间，赤地殆尽”。

河陇地区吐蕃将领们的混战，从根本上动摇了他们对这一地区的统治，使备受压迫和剥削的奴隶们挣脱了枷锁，他们相互聚合在一起，举行起义。《新唐书·吐蕃传》记其事说：“及恐热乱，无所归，共相啸合数千人，以温末自号”。据此，知温末起义的时间，大约始于四八七年左右。温末起义后，遂相纠合为部落，“散在甘（治今甘肃张掖）、肃（治今甘肃酒泉）、瓜（治今甘肃安西东）、沙（治今甘肃敦煌）、河（治今甘肃宁夏）、渭、岷（治今甘肃岷县）、廓、叠（治今甘南叠布）、宕（治今甘肃宕昌）之间”^⑭。“其近蕃牙者最勇而马尤良云”^⑮。

在温末起义不久，由于吐蕃王朝内争和衰弱，唐朝积极收复河陇，致该地区的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早在唐武宗会昌四年（844年），唐朝就密令邻近河陇诸镇，积极准备收复河陇之地，并派刘濬为巡边使专往宣敕^⑯。至唐宣宗大中三年（849年），唐派兵收复了秦州（治今甘肃天水西南）、原州（治今甘肃固原）、安乐州（治今甘肃中卫）等三州，及石门、驿藏等六关（皆在原州境）。在此前一年（即大中二年），沙州汉族大地主张议潮起事，收复瓜、沙两州，以后又陆续收复甘、肃等州。八五一年（唐宣宗大中五年），张议潮所遣使节到达长安，献瓜、沙、伊（治今新疆哈密）、肃、鄯、甘、河、西（治今新疆吐鲁番交河故城）、兰、岷、廓十一州地图。唐朝即置归义军于沙州，以张议潮为防御使。至咸通二年（861年），张议潮又收复了凉州^⑰。张议潮的起义归唐，无疑基本摧毁了吐蕃在河陇地区的统治。

至此，河西等地基本上为张议潮所有，居住于这一地区的温末、吐蕃、回鹘、吐谷浑、羌等族则处于唐朝的统治之下。《敦煌石室遗书》第一集《张氏勋德记》残卷就记：“河西创复，犹杂蕃（吐蕃）、浑（吐谷浑），言音不同，羌、龙^⑱、温末雷威

懽伏。训以华风，咸皆驯良，轨俗一变”。但此残卷系为张氏颂德溢美之词，不可尽信。事实上，张氏对河陇的统治力量是十分薄弱的，特别是在瓜、沙两州之外的各州。温末的起义仍继续发展，且声势还很大。《通鉴》卷二百五十，记载在咸通三年时，“温末始入贡”，即开始以一种自立的集团同唐朝直接发生了朝贡关系。又上引敦煌所出《张议潮进表》也说，凉州在咸通二年为议潮收复，在其进表时，凉州已为温末所“隔勒”。表文缺年代，据文中讲：“……今若废凉州一境，则灵武西，口为毳幕所居，比年使州县辛勤，徂是为羯胡修造，言之可为痛惜”。按唐修整凉州大约是在咸通四年（863年）^①。张议潮是咸通八年入京，十三年死去。因此，可以判断此表应写于咸通四年至十三年之间。至于进表时，议潮是在长安或在沙州，目前还尚难断定。如果从表文中“累询北人”和表与批答日期较近的情况看，此表写于议潮入京初，即咸通八——十年时，可能性更大。此外，斯坦因从敦煌劫去的咸通九年（869年）刻本金刚般若波罗密经贴里的文书中也说：“河西诸州，蕃、浑、温末、羌、龙狡杂，极难调伏”^②。可见，张议潮收复河陇后，该地各族的势力还很大，唐朝的统治力量是很薄弱的。

到了唐僖宗乾符元年（874年）左右，温末甚至联合残存的吐谷浑，击走了盘据在甘州的回鹘。《通鉴》卷二百五十记此事说：“初，回鹘屡求册命，诏遣册立使郝宗莒诣其国。会回鹘为吐谷浑、温末所破，逃遁不知所之”。此所记之“回鹘”应为河西之回鹘^③。《新唐书》卷二百一十七下《回鹘传》记，大中初，有庞特勒（勤）一支回鹘，“居甘州，有磧西诸城。……后十余年，一再献方物”。大中初以后十余年，当为咸通初年，因此疑此屡求册命，后被吐谷浑、温末所破之回鹘，即居甘州之庞特勒（勤）的后代^④。甘州是温末出入之地，据甘州之回鹘曾一度为温末等所破，也完全可能。

从上述一些零星资料看，温末起义的地区不仅很广，而且势力很大。他们逐渐形成强有力的集团，与唐朝中央政府直接发生朝贡关系，并隔勒了瓜、沙两州至长安的道路，联合吐谷浑击走了占据甘州的回鹘。因此，可以说，温末的起义使其自身摆脱了吐蕃的奴役和统治，获得了解放。但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他们又在名义上属于唐归义军的统治，而其起义的性质也逐渐发生了变化。事实上，温末已成为活动于河陇地区一支较为强大的集团。至于其内部情况，由于资料阙如，已不可得知。

至九世纪八十年代，我们从一些零星资料看，温末集团大部分集中在凉州地区，势

力仍然很大。敦煌所出《肃州防戍都归义军状》（斯字0389号）记载：时甘州又为回鹘所逼，吐蕃和部分温末（吐谷浑）相继从甘州撤走。占据甘州的龙家（即上述龙族）与回鹘谈判。龙家企图威胁在凉州的温末遣军三百，帮助守城。状中说：“其龙王衷私发遣僧一人，于凉州温末首令（领）边充使。将文书云：我龙家和回鹘和定，已恐被回鹘侵袭。甘州事，须发遣温末三百家已来，同往甘州，似将牢（牢）固。如若不来，我甘州便共回鹘为一家，讨尔温末，莫道不报”。此状据唐长孺先生考证，当书于唐中和四年（884年）^{②③}。又唐《光启三年（887年）官酒户马三娘、龙蚩堆牒》中，把凉州温末使与肃州使、西州回鹘使等并列^{②④}。这时的河西、陇右之地，张议潮后代所能控制的地区，可能只有瓜、沙两州^{②⑤}。温末也是活跃在河陇地区（主要在凉州）一股重要的势力。直到唐昭宗天佑三年（906年），唐灵武节度使韩逊在奏摺中还提到：“吐蕃七千余骑营于宗高谷，将击温末及取凉州”^{②⑥}。这部分温末似也在凉州一带。

除此而外，据我们所知，温末起义后，有一部分被唐朝将领所利用，迁徙到今四川大渡河一带，为唐防御南诏。咸通初年，吐蕃统河、渭二州将尚延心率部降唐。《新唐书·吐蕃传》说：当时，“秦州刺史高骈诱降延心及浑末部万帐，遂收二州，拜延心武卫将军”。按高骈为秦州刺史在唐懿宗时^{②⑦}，咸通四年迁安南都护^{②⑧}，其招延心及浑末万帐当在咸通初年。此云“万帐”不知包括延心部在内否？即便是包括延心部，河、渭一带温末之众也可想见。到唐僖宗乾符元年（874年），高骈任西川节度使后，为了巩固西川（治今四川成都）边防，防御南诏，又“结吐蕃尚延心、温末鲁厮月等为间，筑戎州马湖、沐源川、大渡河三城，列屯拒险，料壮卒为平夷军，南诏气夺”^{②⑨}。所以，在高骈调任镇海节度使时，卢携上奏说：“及骈节度西川，招温末，缮甲训兵，蛮夷震动……”^{③⑩}。由此可知，温末起义后，一部分散在河、渭二州的温末，投归了唐朝的高骈。后高骈节度西川，一部分温末从甘肃转徙到四川西部大渡河一带驻防。这部分温末的下落，不见记载，恐怕最后融合到当地汉、藏之中。

三、唐代以后的温末

温末之名在后梁时，还有记载。如《册府元龟》卷九七六，外臣部褒异三记：“梁

太祖乾化元年（911年）十一月丙午^①，以……吐蕃温末首领杜论没悉伽、杜论心并左领军卫将军同正。温末苏论乞禄论右领军卫将军同正”。“二年闰五月庚申，温末首领热邈钵督、崔延没相等并授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太子宾客，遣还本部”。上述资料并未明言后梁封敕的温末首领属何部，居住在哪里。自至以后，温末之名再不见于汉文史籍。

一九六三年，笔者随马长寿先生到甘、青作民族调查。据当地人民讲，现在的裕固族（一部分属突厥语族）人民广泛流传着自己祖先的一个故事，说他们在迁到现在的居地甘肃肃南裕固族自治县时（约当明代初年），曾与“浑末（Hong—mon）人打过仗。后来浑末人向东南方逃走了。又解放前青海的汉人还称玉树、果洛一带的藏族人民为“浑末”，且云：“浑末来了，买卖该旺盛了”。

从上述的史料和调查中，我们可以作一个大胆的推测：五代之后，居住于河陇一带的温末曾与西夏、宋朝发生过关系。其后，蒙古人南下，一部分温末可能被迫向西南方面迁徙，逐渐同当地藏族融合，形成了今天青海南部玉树、果洛一带的藏族。

注释：

①见该书第166页，1958年科学出版社出版。

②转见王忠：《新唐书吐蕃传笺证》，第23页等。

③《新唐书》卷二百一十六上《吐蕃传》。

④《通鉴》卷二百五十，唐懿宗咸通三年十一月条。

⑤同上书卷二百二十六，唐德宗建中元年（780）四月《考异》引《建中实录》。

⑥见《敦煌遗书总目索引》，“斯坦因劫经录”第6342号，1962年商务印书馆版，第240页。

⑦赵璘：《因话录》，“译可则条”。

⑧《沈下贤文集》卷十，“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策第二”。

⑨热巴金的卒年，《通鉴》认为是文宗开成三年（838年），误。按藏文史籍应为841年（见《新唐书吐蕃传笺证》）。

⑩《布顿佛教史》云：“此王以七户庶民供养一个出家人”，“由于把政权献给了出家人（或出家人受到政权的保护），引起接受佛教的大臣不满，秘密制定破坏戒法的计划”。（见佐藤长日译文，载《古代吐蕃史研究》附录）。

⑪法尊：《西藏民族政教史》卷二。

⑫郎达马卒于八四六年，《新唐书·吐蕃传》记为会昌二年（842年），误（见《新

唐书吐蕃传笺证》)。

⑬《通鉴》系此事于会昌二年(482年)误。按郎达马死,新赞普立于四七六年,恐热击新任大相尚思当在此年,或次年。

⑭《通鉴》卷二百五十,唐懿宗咸通三年十二月条。

⑮《新唐书·吐蕃传下》。

⑯《李卫公会昌一品集》卷七;《通鉴》卷二百四十七,唐武宗会昌四年三月条。

⑰参见罗叔言:《补唐书张议潮传》;向达:《罗叔言“补唐书张议潮传”补正》等。

⑱关于龙族,敦煌出唐光启元年(885年)写本《沙洲,伊州地志》残卷云:“龙部落本焉耆人,今甘、肃、伊州,各有首领。其人轻锐,建斗战,皆禀皇化”。

⑲《通鉴》卷二百五十,懿宗咸通四年四月记:“左拾遗刘锐上疏曰:“今西凉筑城……”。

⑳转见万斯年译:《唐代文献丛考》,第91页。

㉑回鹘即回纥,原居于漠北,八四〇年左右,因其内乱和黠戛斯的攻击,分三支向西向南迁徙,其中一支迁入河西等地,依属吐蕃。张议潮起义后,又属议潮。(见《旧唐书·回纥传》,《唐会要》卷九十七等)。

㉒《旧唐书·回鹘传》记载更确详,文云:“庞勒(即庞特勒)已自称可汗,有碛西诸城。其后嗣君弱臣强,居甘州,无复昔时之盛”。

㉓唐长孺:《关于归义军节度传的几种资料跋》,载《中华文史论丛》第1辑。

㉔牒文转见藤枝晃:《沙州归义军节度使始末》,载《东洋学报》十二册,第四分册。

㉕同㉓

㉖《通鉴》卷二百六十五,唐昭帝天佑三年正月条。

㉗《旧唐书》卷一百八十二《高骈传》。

㉘《通鉴》卷二百五十,唐懿宗咸通四年七月条。

㉙《新唐书》卷一百四十七中,《南诏传》。

㉚《新唐书·南诏传》。

㉛《五代会要》卷三十记为“梁开平二月正月”。

《十——十四世纪维吾尔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制度》一书的引言

问题的经过

Л. И. 吉洪诺夫著

维吾尔是中亚古突厥民族之一。它的历史引起许多研究中国匈奴、蒙古和其他与维吾尔相邻、保持经常联系的民族历史者的注意。根据汉文编年史资料和阿拉伯、波斯以及突厥史料，已弄清楚许多民族起源、政治历史和迁徙的问题。从十九世纪末开始在新疆进行考古发掘，出土了许多早期物质文化遗物和书面文献。这些新资料的出现大大扩大了维吾尔学的科学基础。鄂尔浑河流域北欧古文字文献的发现就使得能够对维吾尔史上研究得尚不够的古代时期进行透澈的研究。

随着实际资料的积累和对某些问题的深入研究，科学家所涉及的问题范围在逐步扩大。一些科学家力图将分散的资料汇集在一起，撰写从远古时代起的维吾尔史。诚然，许多研究人员开始研究维吾尔史，用的主要是中文文献，很少引用阿拉伯、波斯和突厥作者的著作，虽然它们也报导了许多关于维吾尔人的珍贵资料。在后者之中只要说出伊本·阿西尔，朱维尼和拉希得·哀·丁的著作就足以说明这些资料的全部意义。

第一部关于《成吉思汗和整个蒙古王朝史》的著作是耶稣教徒P.戈比尔^①写的。他在十八世纪三十年代就试图撰写蒙古综合史。不久，得几内^②的《匈奴和突厥起源的历史简述》和四卷本《匈奴、突厥、蒙古和其他西鞑靼人通史^③》问世。维斯得鲁^④出版了他的《鞑靼史》一书。杜·加尔德写的《中华帝国和中国鞑靼的地理、历史、编年、政治和自然记述》也属这一组著作^⑤。

十九世纪初曾引起长时间争论的Ю.克拉普洛特⑥的著作和H.Я.俾丘林⑦的中国维吾尔资料俄译本开始出版。H.Я.俾丘林去世后，E.勃列什涅杰尔⑧从事中国维吾尔资料的翻译工作。多松⑨根据近东文献资料和学术上常用的中国作者的资料，撰写他的著作《从成吉思汗到帖木儿比，或塔麦尔兰蒙古史》。多松是研究蒙古史的，所以对维吾尔不大注意。然而，十九世纪中央亚细亚爆发的人民骚动，又引起了人们对维吾尔和对它的遥远过去的兴趣，并使得有必要编写从远古时代开始的详细的维吾尔历史。B.Б.格里戈里耶夫⑩编写了当时最完备的俄文维吾尔资料汇编。他作了极大的努力，以极认真的科学态度将他所能弄到的所有从远古到十九世纪七十年代的维吾尔的历史、民族和地理资料汇编在一起。虽然考虑到新资料，某些地方还需要补充，但是，B.Б.格里戈里耶夫的著作在资料的完备程度方面现在也仍未失去它的意义。

尽管论述维吾尔的著作很多，但是关于它的民族属性问题仍然有争论。蒙古学家Я.什米特和И.班扎罗夫不认为维吾尔人是突厥人。十九世纪将要结束的时候，出现了两本著作，以后没有人再表示意见说，维吾尔不是突厥人。B.Б.拉德洛夫主要注意的是研究突厥和近东的资料⑪，而И.波兹涅耶夫则是翻译中国的资料⑫。И.波兹涅耶夫在他著作的第一部分详细地研究了已出版的关于维吾尔问题的书籍。

B.Б.巴托尔德的许多著作也含有许多珍贵的维吾尔史资料⑬。他对许多资料非常熟悉，这使他能够对维吾尔过去历史上的许多问题作出令人信服的结论。

许多俄国旅行家也很注意维吾尔和其他古时居住在天山东部的民族的历史问题。Г.Е.格鲁姆·格尔日麦洛在中央亚细亚旅行报告的第二卷中对北山⑭过去的历史作了专门的叙述。他和B.Б.格里果利耶夫一样，也对各个作者的资料进行了综合、分析，补充了在考察古代遗物时获得的本人观察的情况，并叙述了居住在北山的民族的政治历史。他所报告的一系列事实可以作为维吾尔社会关系史一些结论的旁证。

2) 沙畹和П.伯希和⑮对研究中央亚细亚文化和语言史的许多问题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们两人不仅在下述著作中，而且在其他许多著作中都曾翻译史料，解释术语并研究某些共同的历史问题。

法国大汉学家Г.科尔季叶出版了四卷本的《中国通史》⑯。该著作的第二卷专门论述突厥和蒙古。

科尔季叶学识非常渊博，这就使得他能够利用大量中国和中央亚细亚的历史

资料。由于他是《通报》杂志的创办人和编辑，他知道在汉学、蒙古学和突厥学，亦即作为研究中央亚细亚历史的基础的那些领域的最新科学成就。

中央亚细亚史在列奈·格鲁赛的专门论述远东的两卷本著作中也占有很重要的地位^{①⑦}。但是，格鲁赛主要注意的是政治史，甚至连蒙古征服的后果他也是从这个观点来看的。

1934年Б.Я.符拉季米尔佐夫的学术著作出版^{①⑧}。Б.Я.符拉季米尔佐夫的功绩是他克服了写成吉思汗家族的政治史的传统，这一传统在研究中亚细亚和中央亚细亚的许多历史学家中当时很盛行。他力求表现人民的经济、法律地位；统治阶级奴役人民的方式。虽然Б.Я.符拉季米尔佐夫在他的著作中没有涉及维吾尔，但在阐明封建主义发展的某些共同问题时，特别是在研究社会术语和税目时，必需参阅他的著作，因为一部分术语在维吾尔人和蒙古人那里都有。

В.В.拉德洛夫和Л.М.波兹涅耶夫的著作出版后，在维吾尔早期史研究方面中断了很长时间。可以把这一时期称为新的实际材料积累时期。

此外，1947年А.Ю.雅库鲍夫斯基还试图根据阿拉伯和波斯文献阐明九——十世纪维吾尔王国的历史^{①⑨}。过了十年，即在1958年出版了一本中文书。该书作者讲述了从远古时代到十六世纪初的维吾尔历史^{②⑩}。

1961年А.Г.马利亚弗金写的论十一——十二世纪中国的维吾尔历史资料^{②⑪}一文问世。在日本发表了几篇论述维吾尔历史、文化问题和书面文献的作品^{②⑫}。在这一时期А.加宾出版了一本论述建都于高昌的维吾尔王国的书^{②⑬}。

在《亚巴拉哈玛尔三世和萨乌玛拉班史》一书中没有提到维吾尔王国的城市，但提到唐古特和喀什噶尔两城。后一城已被洗劫一空。同时还提到卢坦（Лутан）城。某些注释者认为该城可能就是和田。这一推测大概是对的。马可波罗也曾从和田及一些唐古特城市经过。但是，在确定亚巴拉哈的路线时应该注意到两种情况。众所周知，萨乌玛是维吾尔人，住在汉巴雷克，是到他的故城卢坦来了。他受到亲属和朋友们的迎接。大家知道，和田不曾被维吾尔人占据，它是在信奉伊斯兰教的哈喇汗王朝的国家里。于是就产生一个问题：维吾尔人——萨乌玛的亲属和朋友——怎么能来到和他们敌对的城市和田呢？亚巴拉哈和萨乌玛从唐古特城到喀什噶尔去可以走北路，在这种情况下住着维吾尔

居民的鲁克沁城就在他们的道路上。鲁克沁当时是个大城，该城的亚麻布很驰名，很受人们的赏识^{②4}。应不应该把卢坦和鲁克沁当成是一个地方呢？

二

维文书面文献对研究维吾尔历史有着很重要的意义。书面文献的积累与对维吾尔许多古代文化中心进行的考古发掘工作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俄国科学在这方面起的作用非常巨大。旅行家、考古学家、语言学家和其他许多人对收集和研究古代维文文献，其中包括公文，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医生和植物学者 A. O. 列格利早在 1879 年就绘制了维吾尔王国原来的首府火州城的平面图。该城的遗址在吐鲁番绿洲^{②5}。这一最早的关于喀什噶尔地区古遗迹的报导并不孤单。不久，H. Φ. 彼得罗夫斯基收集的资料就运到我们的一些博物馆。彼得罗夫斯基对维吾尔的历史和文化很熟悉，所以他收集手稿和物质文化遗物时顾及着科学的利益。H. Φ. 彼得罗夫斯基收集的手稿，许多年来一直是我国维吾尔学的重要基础^{②6}。一些作品被认为是独一无二的，只有我们的收藏品中才有。他寄到彼得堡的考古资料引起俄国学者们对中央亚细亚各民族古代文化的兴趣。在报刊上出现了一些文章。这些文章对资料本身进行了研究，并对俄国科学提出了这一方面的任务。佛学和印度文化的大行家 И. П. 米纳耶夫写道：俄国科学必须开始对喀什噶尔广大地区进行历史考古考察^{②7}。在《俄国考古学会东方分会会刊》上刊载了 Г. 基泽里茨基的一篇关于 H. Φ. 彼得罗夫斯基收藏的和田古物的论文^{②8}。H. Φ. 彼得罗夫斯基本人发表了一系列含有许多珍贵资料的短文。这些资料现在仍未丧失其科学意义^{②9}。

俄国考古学会拟定了一个考察新疆地区的大规模计划。甚至只是部分地完成这一计划，就已给科学提供了各种各样的有重要科学价值的资料，只要指出保存东方语言书面文献的主要中心——科学院亚洲博物馆——所收到的某些东西即可说明问题了。1896 年俄国地理学会寄来一袋东西，里面装的维吾尔和中国手稿的残片。这是 1894—1895 年 П. К. 科兹洛夫和 B. И. 罗鲍罗夫斯基考察团主要在吐鲁番绿洲购买和收集的。

收到这些东西后，自然就产生了考察的念头，目的是对许多古迹进行广泛的考察，并收集古维文书面文献。1898 年科学院派以 И. 克列门茨为首的第一个俄国考古考

察团去吐鲁番绿洲。虽然考察团具有的经费非常有限，人只有三个，而给的时间总共只有四个月，但它还是收集到了大量各种资料。

不能不指出，Л. А. 克列门茨在收集资料，特别是壁画时态度极其认真^⑩。考察团没有进行发掘工作，只限于考察古迹的地理位置、完善程度，以及从居民那里购买一些手稿。这些手稿以后送到了亚洲博物馆。在大量佛教内容的片断中有公文文献^⑪。在А. 克列门茨之后，又去了许多不同的考察团。1900年А. 斯坦因开始了他的考古工作。多次发掘的成果中有一部分已在报告和著作中公布。对本书具有重要意义的是一些文献和物质文化遗物。它们能使人了解维吾尔人早期生活的许多方面。许多文献已被Э. 沙畹和Ф. 托马斯^⑫翻译。所收集的资料包括广阔的南部地区，其中包括古代和田及和田东北的一些城市。

T. 巴罗乌出版了约750件带有英文译文的佉卢文文献^⑬。在许多年期间Ф. 托马斯发表了许多带有英文译文的西藏文献^⑭。

А. 斯坦因收集的中央亚细亚文献最后一次公布是在法国大汉学家А. 马斯佩罗的一部有重大价值的著作中进行的^⑮。

А. 马斯佩罗对在敦煌、楼兰、吐鲁番地区、塔里木盆地和故城喀拉浩特（即：黑城。——译者）发现的607件文献进行了识读，并译成了法文。

发掘时所发现的资料是属于不同时代的。其中佉卢文文献写于一——三世纪，而汉文文献是蒙古人统治中央亚细亚时代的。许多经济和社会生活现象要在不同地区和不同时间加以彻底地研究。因此，不能认为这些现象是偶然的，或者只具有地方意义。相反，这些现象使人们能够查明维吾尔的历史过程发展的基本规律性。

在考察南部绿洲的同时，也开始了对北部和东部绿洲的考古发掘。1902——1903年А. 格伦维德尔领导的考察队在吐鲁番绿洲进行考察。在那里发现了大量各种残片，其中有许多古代维吾尔文献^⑯。

1904——1905年А. 勒柯克领导的考察队对吐鲁番绿洲进行了考察。和上述考察队一样，该考察队也收集到很多资料。1906—1907年格伦维德尔和勒柯克在吐鲁番绿洲又进行了一次考察，此外，还开始了对其他绿洲——喀喇沙尔、库车和哈密绿洲——的考察。在别泽克利克和亦都护城附近的《K》废墟，发现了非常多的公文文

献。格伦维德尔格和勒柯克领导的两个考察队，除书面文献外，还运出来大量的壁画，其中许多保存得相当完好^②。

俄国中亚和东亚研究委员会于1906年向库车派了一个考察队，以便从考古方面对该绿洲进行预备考察。有经验的旅行家M.M.别列佐夫斯基在资金很少的情况下，收集到了珍贵的资料，其中包括文献中著名的甲种文字（可能是指所谓吐火罗语甲种方言——译者）的手写文献。M.M.别列佐夫斯基此行^③的目的是为1909年C.Φ.奥登堡领导的大型考察队能较顺利地进行考察准备条件。该考察队考察了库车，喀喇沙尔和吐鲁番三个绿洲。C.Φ.奥登堡领导的第二个考察队在1914——1915年考察了该地区，并收集到许多资料^④。

同时，科学院亚洲博物馆开始从A.A.季亚科夫（1908年），H.H.克罗特科夫（1909年的第一批收集品），科哈诺夫斯基和其他对收集古文献有兴趣的人那里得到他们收集的古代书面文献。C.E.马洛夫为了研究维吾尔的语言和生活，考察了该地区，并运来大量各种书面文献。H.H.克罗特科夫的收集品是亚洲博物馆所收到的最丰富的公文文献。

П.К.科兹洛夫领导的中央亚细亚考察具有极其巨大的科学意义。这次考察查明了喀拉浩特遗址的所在地^⑤。考察队收集了大量书面文献，主要是唐古特文献，其中也有几件维吾尔文献。

中央亚细亚书面文献到达许多藏书库后，引起了许多学者对它的兴趣。在俄国由B.B.拉德洛夫开始公布，1899年他公布了两个文献^⑥。他不仅自己识读和翻译，同时还培养他的学生对这些文献的兴趣。继续公布和翻译文献和其他维吾尔文化遗物的C.E.马洛夫就是他的一个学生。

B.B.拉德洛夫和C.E.马洛夫在研究维吾尔公文文献方面功绩非常巨大。1928年出版的，第一部大型原文出版物带有德文译文，大量注释和辞典。这一出版物引起了历史学家的兴趣^⑦。C.E.马洛夫在此之后继续公布附有俄文译文的文献。他不仅比较准确地解读、翻译了以前发表的文献，而且还有他自己和C.Φ.奥登堡收集的新文献。为了描写突厥语文字的发展过程，C.E.马洛夫在他的《古突厥文字碑铭》一书中，拟定了一个广泛的目录。他专门写了一篇来谈法律文献^⑧。公布文献的数量，随着C.E.马洛夫的每部新作品的问世在增加。由于C.E.马洛夫是突厥语历史方面的大行家，他用广泛的语言材料作了许多注释。这一特点也是他书中所载辞典的写

照。新辞典比1928年出版的辞典完备得多。这一很好的文献使人们能够在必要时去直接查阅古文献。书籍目录很齐全。

1954年中国的历史杂志刊载了两个文献的照片，及其中文译文^④。这两个文献的出版者在它的前面写了历史引言，并给译文加了注释。

黄文弼的著作专门论述高昌的早期历史。里面引用有在吐鲁番绿洲发现的六一七世纪墓石上的中国碑铭^⑤和高昌在唐帝国管辖之下^⑥时的维吾尔文献。黄文弼的著作附有注释。

B.班格和A.加宾公布了大量从吐鲁番绿洲发现的文件。引起人们兴趣的不仅是原文的本身和译文，而且还有大量注释和目录^⑦。

许多学者都在从事维吾尔文献的研究，发表附有语文注释的译文，试图确定文献写法的时间，并给以古文字学的评定。但是历史学家在研究维吾尔社会中世纪史时，并没有利用这些文献。虽然，从十九世纪末这些文献就对学者们开放了，但是，A.H.伯恩斯坦只是在1940年才发表了一篇论文。他在论文中，把这些文献认为是历史文献^⑧。1950年A.K.基比罗夫发表了论述十三——十四世纪维吾尔社会经济制度的候补博士论文和一篇论维吾尔奴隶制度的文章^⑨。A.K.基比罗夫最先把维吾尔文献用作他的论文的基础，但是他把文献写法的年代范围定成了十三——十四世纪，虽然某些文献可能是较早时期的。

Э.П.捷尼舍夫和冯家升的关于宾童格（一奴隶的名子。——译者）的文献^⑩的公布引起了人们的兴趣。C.E.马洛夫也公布了一件关于宾童格的文献（51）。T.拉姆斯捷特1940年公布了四件维吾尔文献，对文献作了翻译并加了注释（52）。近来在日本也出版维吾尔文献，其中包括公文文献。

在鄂尔浑河文献中有关于八——九世纪维吾尔王国的珍贵资料（53）。文献中谈到一些政治事件，列有被维吾尔王国征服的民族的名称和诸汗的名子。北欧古文字文献对研究语言和文化很重要。其中两件被认为是维吾尔文献，一件是纪念维吾尔磨延啜可汗的墓志铭，一件是《苏贾碑铭》。第一位解读了鄂尔浑河碑铭的是丹麦突厥学家威廉·汤姆逊。B.B.拉德洛夫和C.E.马洛夫在研究北欧古文字文献方面作了不少工作。

对维吾尔王国古迹进行的考古考察以发现了写在纸上的北欧古文字文献而著称。这些文献是八世纪的。它们在内容方面与鄂尔浑河碑铭不同。一件文献含有萨满教性质的